

晋唐名人与沃洲山水

——白居易《沃洲山禅院记》考释

竺岳兵

(接上期)

以上第三段，单以真封寺为记。

原文第四段：

太和二年春，有头陀僧白寂然来游兹山，见道猷、支、竺遗迹泉石尽在，依依如归故乡，恋不能去。时浙东廉使元相国闻之，始为卜筑；次廉使陆中丞知之，助其缮完。三年而禅院成，五年而佛寺立。正殿若干间，斋堂若干间，僧舍若干间。夏腊之僧，岁不下八九十人，安居游观之外，日与寂然讨论心要，振起禅风；黑白之徒，附而化者甚众。

考释：

如前所述，支、竺非居一地，故“始为卜筑”，是指在道猷、支、竺旧址上，选择一处建屋的意思。按前所考，白寂然选建于支道林之地。

本段“太和二年春……恋不能去”记沃洲山，“时浙东廉使……附而化者甚众”单记“真封寺”。

原文第五段：

嗟乎！支、竺歿而佛声寔，灵山废而法不作，后数百岁而寂然之，岂非时有待而化有缘耶？六年夏，寂然遣门徒僧常赞，自剡抵洛，持书与图，请从叔乐天乞为禅院记。昔道猷肇开兹山，后寂然嗣兴此山，今乐天又垂文兹山，异乎哉，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！

考释：

白香山《寄韬光禅师》云：“一山门作两山门，两寺原从一寺分。”说明闍黎最喜自立山头。沃洲山即为支、竺所有，则后来者虽是释门伟器，亦不免做小家碧玉。这个道理，佛学家是最懂行的。韬光寺一分为二，正是这个原因。也因为此，南朝寺庙数量，比东晋要多得多，比杜牧说的：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要多三倍！（如下表）

| 朝代 | 僧尼数(人) | 寺数(座) | 资料来源 |
|----|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东晋 | | 1768 | 韩国磐《魏晋南北朝史纲》 |
| 宋 | 3.6万 | 1913 | 《南朝佛志》 |
| 齐 | 3.25万 | 2015 | |
| 梁 | 8.27万 | 2846 | |
| 陈 | 3.2万 | 1232 | |

其中，齐梁间僧护、淑、祐，毕三生之功，在《沃洲记》中提到的兴、渊、道、邃、开、威旧居地雕凿的通高十丈的石窟大佛（唐石城寺，今新昌大佛寺）最为壮观。梁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，在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碑》称赞它是鸿姿巨相、旷世之宝。他还阐明了造像的原因：“般若炽于香城，表刹严于净土。”意谓沃洲山是般若学说昌炽的地方，所以建造起这宏伟的佛寺。后世据此称石像为“支竺遗风”的积淀。据《天台山方外志》卷三：沃洲山黄坛潭有佛教天台宗祖师“智者放螺处”，知他经沃洲溯剡溪去石梁方广开山。还有南山宗唐道宣律师以及元严、大义、神楷、智威、普岸、皎然、灵澈、灵一等，还有宗密、立公、就师、道契、不思、普门、隐空、贯休、昭、坚、微、晏、择、中、禀、觉、旻、详、惠、简等等。他们或驻锡于沃洲山及其附近，自开山门；或似社燕秋鸿，寻觅佛根。像白寂然、慧朗那样，一定要在支道林的旧址上挂锡的，却是少数。

但是，资料表明，释门高材举踵沃洲，除朝觐以外，许多是赴讲的。而既有赴讲，则必有众多的听众。开成年间（836—840年），以元英为首的、由1250名社员结成的九品往生社的出现，即可证见。由此观之，唐时沃洲山，不失

是佛教的热点。

还应说明的是：东晋时期般若学的六家七宗与唐末时期南禅的五家七宗、支道林与褚裒，孙盛辩论南北治学之异，鸟巢和尚道林同白居易讨论南北两禅教义之别、北禅的渐悟说与南禅的顿悟说，不是偶然的巧合，而是中国佛学史上流传时期与盛行时期的必然产物。换言之，形成于唐的南北两禅，北禅早早地失去了生命力，而南禅却发展盛行起来，及至于唐末，吴越成了中国的佛教中心的原因，在于慧能发挥了支道林的“谁谓冥津远，一悟可以航”的顿悟说，据此而言，支竺歿而宗风远播。

按乐天此记，前面说：“厥初，有罗汉僧西天竺白道猷居焉。”本段云：“昔道猷肇开兹山”，则白道猷为沃洲山始祖。但所引“连峰数十里”诗，按梁《高僧传》为帛道猷招道一共隐时作；帛道猷为山阴冯氏之子，遂软立亦主此说。乐天因有此舛互，遂启后人之疑。《东[山印]志略》云：“若谓古人飞白与飞帛二字通用，则道猷乃一人也”。又说：“大约西竺罗汉乃白道猷，山阴冯氏子为帛道猷，固两人也。”执疑不决。《灵异志》转引《西域志》云：天台山石梁桥方广寺五百罗汉之所住持，其灵异事迹，往往称著，如帛白道猷尊者隐显……”据此则白道猷确

有其人，然事在石梁，不在沃洲山。《剡录》说：“白道猷，罗汉僧，来自西天竺，居沃洲山。竺道一在若耶山，道猷以诗寄之。天台山水清险，前有石桥……师梯岩壁……”其说虽圆，但显系撮合各说，置帛道猷于不顾而成，不足为信。这样，帛白是非，迄无定讞。笔者亦因史料有限，不敢师心自用而只好存疑。

不过，无论是白道猷还是帛道猷，均不是“肇开兹山”者。首先如《东[山印]志略》说：竺道潜（即竺法深）之隐山在成帝咸和间（326—334年）。而按帛道猷作诗招道一事，当在道一太和中（366—371年）出都之后；若是白道猷，则据《天台山志》记载，其入山在兴宁（363—365年）间，帛白与竺比较，竺捷足此山已近有三十年。其次，据各志书和近年当地文史工作者考证，白或帛住沃洲小岭，与支道林同处一地，而按《世说》支道林不是向帛或白而是向竺道潜买山。由上看来，开山者不是帛白，而是竺道潜。

本段单记沃洲小岭一寺，借以说明“三白”（白道猷、白寂然、白居易）与沃洲山有缘。

如上所述，竺道潜是沃洲山（即[山印]山）的开山祖师；白寂然所建寺名为真封寺，白居易所以用《沃洲山禅院》作为记的题目，是为了拓宽和加深作品的主题；沃洲山在晋唐两代，是名山荟萃的“非常之境”，是名副其实的东南山水之眉目。而《沃洲记》说白道猷“肇开兹山”，又说在白寂然重建禅院前，这里“罕有人游”云云则完全出于行文之需要。而从下述考察中可知，它恰好说明沃洲山是白居易晚年心灵的依托：

论家都认为白居易贬江州，是他前后期人生观的转折点。在此之前，儒家思想起主导作用，积极用世；在此之后，明哲保身，释

道思想占了上风。这从他的思想发展趋势来说是对的。但是，由原来的人生观转变到另一种人生观之间，不会是说变就变，而必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。从他一生所作的25篇记体文章看，这个过程，似在它贬江州后所作的《草堂记》到本文考释的《沃洲记》之间。在此以前，即43岁以前，他写有《养竹记》《记画》《许昌县令新厅壁记》《记异》4篇，以竹比贤，以清白坚直自励，没有一篇是记佛寺的；46岁，即贬江州之后到55岁，有《记》8篇，其中记闲适、园林等5篇，记佛寺的3篇。《草堂记》云：“中设……儒释道书各三两卷……又安得不外适内和，体宁心恬哉！”《江州司又新厅壁记》云：“官不官，系乎时也；适不适，在乎人也。”记佛寺的3篇，均只记事物之始末，述而不作。再从他在贬江州那年的十二月间，写给元稹的一封长信（即《与元九书》）中“始得名于文章，终得罪于文章”看，似有大悔之意。但同时又说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诗歌合为事而作”的主张，把诗歌看作是“稽政之辅”，说明这时期他虽已开始追求随波沉浮的道路，但还处在儒释道三者的矛盾中解脱出来，在沃洲山这一富有典型意义的人文环境中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。

由上看来，白居易前后人生观的转变，是从作《草堂记》开始到《沃洲记》完成的，时间跨度有15年之久。换句话说，人生观的最后裂变，是以《沃洲记》为标志的。白居易早年避乱在越，晚年心归沃洲的事实，说明沃洲山对唐人具有很大的魅力。近来学术界出现了把晋唐文化联系起来，作整体性研究和把人文地理放到文学发展轨迹上作研究的情况，这是十分可喜的。但笔者以为，倘能把这些研究结合起来，作综合性的全面考察，则必能使研究更深一层。这是本文的出发点。

的考释中，已知他是如何组织素材进行综合熔裁，来表达他“异乎哉，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”这一喜悦心情的。下面再举两事来说明这一点：

首先，本文前面说过，他曾在越中避乱四年多，任杭州刺史时，与元稹频频酬唱吴越山水；他还有“缱绻缱绻何所似，不似罗绡与纨绮。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，四十五尺瀑布泉”（《缱绻》）这样真切动人的诗句和“若似剡中容易到，春风犹隔武陵溪”（《赠薛涛》）这样的诗句，说明他对沃洲山是非常熟悉的。

其次，他68岁时写的《白苹洲五亭记》，也是凭湖州刺史杨汉公“絨书赉图”的第二手资料写的，但他竟“按图握笔，心存目想，颯缕缕概，十不得其二、三”，无法写下去。而在《沃洲记》中，我们看到他对材料的取舍，是那样地熟练自如！他所倾注的感情，是那样的洋洋不可收止！何则？他说：“境心相遇，固有时耶？盖是境也”，“两记所异，在于‘境心相遇’与‘境心相离’，可见《沃洲记》不是应酬之作，而是他终于从儒释道三者的矛盾中解脱出来，在沃洲山这一富有典型意义的人文环境中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。

由上看来，白居易前后人生观的转变，是从作《草堂记》开始到《沃洲记》完成的，时间跨度有15年之久。换句话说，人生观的最后裂变，是以《沃洲记》为标志的。白居易早年避乱在越，晚年心归沃洲的事实，说明沃洲山对唐人具有很大的魅力。

近来学术界出现了把晋唐文化联系起来，作整体性研究和把人文地理放到文学发展轨迹上作研究的情况，这是十分可喜的。但笔者以为，倘能把这些研究结合起来，作综合性的全面考察，则必能使研究更深一层。这是本文的出发点。

“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”公益广告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国家

富强 | 民主 | 文明 | 和谐 |

社会

自由 | 平等 | 公正 | 法治 |

公民

爱国 | 敬业 | 诚信 | 友善 |

新昌县文明办
新昌县融媒体中心 宣